



当代博士文库·马克思主义理论卷



STUDIES IN
MARXISM SOCIAL
RISK THOUGHT

本专著以文本解读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风险问题的直接论述中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基本观点。

本专著在阐释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特点及其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提出应对社会风险的三个基本原则，进而论述了应对社会风险的实践机制、构建风险管理智库等对策。

莫凡／著

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研究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研究 / 莫凡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226-04657-9

I. ①马… II. ①莫… III. ①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风险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243958 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李依璇

装帧设计: 马吉庆

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研究

莫 凡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1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17.25 插页2 字数269千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ISBN 978-7-226-04657-9 定 价: 38.00 元

序

社会风险预警与防范是 21 世纪各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关头，如何应对社会风险，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化解、权益保障机制等，更是一个多学科学术研究需要探索的难题。要破解这一重大难题，不仅需要实践经验的积累，还须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探究与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风险基础理论。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风险思想，具有突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与意义。

尽管社会风险的研究在当代学界已经是一门“显学”，并且已经逐渐成为大众传媒的常用语，但通常认为，“风险”范畴是一个舶来品，因而鲜有学者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风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对该问题的探讨具有一定开拓性。

在这部专著中，作者详尽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形成、发展，系统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历史时期关于社会风险问题的相关论述。通过总结、提炼，作者认为，社会风险的产生根源主要是社会转型、资本悖论、利益困局与文化冲突，而马克思主义应对社会风险的基本设想是物质储备充足、根本利益一致、群众路线与多元文化相互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社会风险根源的寻找要以经济领域为基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悖论无疑是社会风险的发源地之一。在马克思那里，资本既创造出资本主义社会雄厚的物质基础，给人类带了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又是暴力、危机、道德沦丧的诱因。正如他所说的：“资本是一个活

生生的矛盾”。乌尔里希·贝克和吉登斯认为风险社会的根源是现代化进程与科技进步。问题是，现代化进程和科技进步的幕后推手是谁呢？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是“资本”。资本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高度发展，由此带动了社会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这种作用被马克思誉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但是，与此同时，资本又是风险滋生的有力推手，这便是资本作用的两难悖论。在恩格斯的研究中，也有利益背离导致社会冲突的思想，体现在他 1845 年 2 月 8 日《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在此不再详述。

社会风险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还极少有人涉猎的处女地。作者探索社会风险，本身就要面对拓荒的风险。正如初生之犊不怕虎，作者以拓荒者为典范，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风险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风险预警与防范的实践，认为经典理论所确立的风险处置原则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实践策略，即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前瞻性机制建设为落脚点和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归宿。这些观点，无疑对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该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深挖了大量经典文献材料，使得整部著作内涵丰富、系统性强。由于该书涉及的问题较为前沿，且为一个新的探究性领域，该书的出版，犹如抛砖引玉，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理论问题的学术研究与思想争鸣。

谭培文

2014 年 9 月 16 日于桂林

目 录

绪 论 ····· 001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001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003

三、基本概念界定 / 008

四、本书的可行性、思路与创新之处 / 02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来源 ····· 025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现实来源 / 026

一、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社会风险问题 / 026

二、社会主义国家应对社会风险的实践探索 / 031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理论来源 / 037

一、社会风险研究的古代起源 / 037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直接来源 / 04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概念的形成 / 046

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风险概念的萌发 / 046

二、列宁：社会风险概念的继续探索 / 051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概念的确立 / 053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基本内容 ····· 058

第一节 社会风险的分类与特征 / 058

一、社会风险的分类 / 058

二、社会风险的特征 / 065	
第二节 社会风险的产生根源 / 069	
一、社会转型 / 070	
二、资本悖论 / 074	
三、利益困局 / 079	
四、文化冲突 / 083	
第三节 应对社会风险的基本设想 / 087	
一、物质储备充足 / 088	
二、根本利益一致 / 093	
三、群众路线 / 098	
四、多元文化相互包容 / 102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发展与影响 ·····	107
第一节 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社会风险研究 / 107	
一、对经济风险问题的涉足 / 108	
二、资本通过联合使自己免遭风险 / 111	
三、风险会从商品价格中得到补偿 / 117	
第二节 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风险考察 / 122	
一、农民由自担风险向劳动社会化转变 / 122	
二、经济风险转化为政治风险 / 124	
三、政治风险的最高形式是战争风险 / 127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风险分析 / 129	
一、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内社会风险 / 130	
二、国内经济风险演化为政治风险 / 136	
三、公共领域的风险转化为社会整体风险 / 143	
第四章 中西社会风险思想比较与借鉴 ·····	151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风险思想 / 151	
一、先秦：辩证、伦理、民本的风险思想 / 152	
二、秦汉至明末清初：修身、人治、循规的风险思想 / 158	
三、清末至民国：适度、西化、革命的风险思想 / 164	

第二节	西方社会风险思想 / 168
一、	色诺芬到凯恩斯：风险产生利润 / 168
二、	亚里士多德到哈耶克：民主、责任、自由与风险之关系 / 174
三、	柏拉图到乌尔里希·贝克：个人与社会的风险研究 / 179
第三节	中西社会风险思想比较分析 / 184
一、	方法的分野与借鉴 / 184
二、	视角的差异与借鉴 / 188
三、	对策的互补与借鉴 / 191
第五章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对策研究 …… 196
第一节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特点 / 196
一、	全球化语境中的“社会风险” / 197
二、	当代中国的社会风险特点及成因 / 199
三、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负面影响 / 204
第二节	应对社会风险的基本原则 / 211
一、	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 211
二、	以前瞻性机制建设为落脚点 / 214
三、	以社会全面发展为归宿 / 218
第三节	应对社会风险的实践机制 / 221
一、	社会风险的定期评估机制 / 221
二、	社会风险的定期预报机制 / 228
三、	风险管理的开放竞争机制 / 234
第四节	构建风险管理智库 / 246
一、	管理效果评价智库 / 247
二、	管理经验总结智库 / 250
三、	管理理念交流智库 / 253
参考文献	…… 257
后记	…… 267

绪论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社会风险”是当代社会的常见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遇到食品安全、流行病传播、群体性事件等可能危害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同时，在经贸活动与行政管理中，“社会风险”也是常用词汇。从中国的风险实践来看，“风险”对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加深。2011年日本核泄漏危机曾一度引发中国社会的“盐荒”，同年的上海“染色馒头”事件也加剧了社会成员对食品安全的担忧。鉴于此，众多学者对风险问题凸显的当代中国社会做了各种描述性界定，如矛盾凸显期、中等收入陷阱、高风险社会等，正如庄友刚所说：“在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中，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全球风险社会的一个部分。”^① 防范乃至管理社会风险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目前国内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起步较晚、能力较弱，直至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社会风险预警与应急机制”才以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当前，这一机制仍存在若干问题，如突发事件的强度超出预案的假设、风险管理的制度化与长效化不足、风险防范的统筹机制尚需加强，等等。

由于社会发展的速度往往超过机制建设的速度，因而常常导致风险管理的滞后性凸显，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在中国，它所具有的一个特征也导致了其与西方社会的一大区别，这就是‘压缩的现代化’……这种

^① 庄友刚：《资本关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定位——从当代风险社会谈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6)。

现代化既加强了风险的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①在他看来，与西方面临的第二现代化（走向风险社会）不同，中国社会正处于第一现代化（走向工业社会）与第二现代化并存的阶段。于是，在社会管理机制尚未完成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风险社会过早地到来了。贝克的话是有道理的，他看到了中国社会风险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状况，但他认为中国没有留够建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必要时间却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正如国内学界所认为的那样，中国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建构和完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时间正是这个“机遇期”。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约束和控制风险因素给社会整体造成的负面影响，走好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这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并在其指导下探索中国社会风险发生、发展与管理的一般规律，为建构实效性较强的风险防范与管理机制作若干前瞻性研究，就具有了较为显著的实践价值。

要建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必须有相关理论的针对性指导。当代社会风险理论创立于西方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是其中的“风险社会”理论，关于“风险社会”理论与“社会风险”理论的异同后文还将论述。国内学者常常把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西方学者划分为三大流派，即以“风险社会”首倡者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的制度主义流派、以拉什和普里特威茨为代表的文化意义流派和以劳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但是，社会风险研究作为西方的一门显学，其理论外延并不止于此。芭芭拉·亚当、约斯特·房·龙、奥尔特温·雷恩等学者均在该领域中有所建树。总的说来，西方社会风险研究试图说明这样一种社会转型，即由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克服“贫困”与“短缺”的需求转向工业或后工业社会中人们对“安全”与“健康”的需求。简言之，“我饿”的状态变成了“我害怕”的状态。就西方社会而言，这一理论的确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是，如果试图直接用西方社会风险理论来指导中国风险管理，就会面临两个问题：其一，该理论不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于是不可避免地具有若干理论缺陷。在学术探讨中，已有学

^① [德] 乌尔里希·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5）。

者对此发表了看法。例如，贝克认为，由于现代性风险往往不像传统风险那样看得见、摸得着，它是“无形”的，于是需要专家来对其进行预测和鉴别。在这里，专家之所以能够预测风险，是因为他手中掌握了大量现代科学知识。可是，社会风险的产生往往要快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如支持这一观点的美国学者弗兰克·费舍尔所说：“在现代科学家们还不能在饮用水中识别细菌存在之前，数以万计的人死于能够引起伤寒症、天花、肺结核和黑死病的看不见的细菌。”^①因此，仅仅依靠专家的预测来防范社会风险的“单打一”做法往往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中国抗击“非典”的经验表明，对抗流行病的蔓延必须在尊重专家意见的同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如贯彻合理的隔离治疗措施，这样才能达到较为显著的效果。其二，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坦言的那样，中国社会的风险状况较西方更为复杂，它在风险特征上与西方存在一定差别，所以西方社会风险理论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值得怀疑。例如，劳的“新风险”理论将种族歧视列为现代社会的“新风险”，但是在中国社会，“民族”问题显然较“种族”问题更为突出，“民族分裂”风险大于“种族歧视”风险。因此，如果对西方社会风险理论照抄照搬，不但无法指导中国的风险防范实践，恐怕还会产生更大的风险。因此，社会风险的理论研究应当由介绍西方风险理论转向发掘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但是，这一研究思路的既有研究成果常常局限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审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即使是直接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研究成果，也缺乏对经典文本的深层发掘。所以，以文本解读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风险问题的直接论述中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基本观点，让这一思想完整、系统地展现出来就具有了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在国内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研究社会风险问题，主要有三条路径：

^① [美] 弗兰克·费舍尔著，孟庆艳编译：《乌尔里希·贝克和风险社会政治学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

其一，用马克思主义审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庄友刚在《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初步尝试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研究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当代社会已经进入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因而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视角，在分析风险社会来临的历史发展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观点的前提下，对当代全球风险社会“实践存在论基础、社会历史成因、社会发展难题以及未来历史趋势等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在哲学高度上利用历史辩证法全面揭示风险社会的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①刘岩的《风险社会理论新探》也有着类似的思路。邴正这样评价该书：“本书较系统地分析了风险研究的各种理论，做了大量的文献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思想脉络和理论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批判，就类型风险、风险文化的二重性、风险意识启蒙、风险责任伦理等问题提出了自己颇有创见的观点，在学术上很有启发性。”^②贾英健等学者在《风险社会的人学研究》中指出，全球化和现代化造成的最大后果是世界交往的普遍提升与深化，由此产生了众多的全球性风险，并使“风险社会”成为当代任何发展主体都必须面对的客观社会存在，这预示着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和生存方式的“风险生存”的出现。“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哲学的生存基础、研究主题、思维范式以及话语方式，使以现实性生存为基础和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而凸显了对该问题进行人学阐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③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具体社会风险问题。2001年，冯必扬撰写了《来自竞争的风险——我国转型期的竞争与社会风险》一书，书中“笔者选择我国转型期竞争与社会风险问题作为论题，以期通过本书的探索，找出我国转型期竞争导致社会风险的内在机理，从而为防范竞争的社会风险提供理论依据”。^④刘先春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挑战与对策研究：风险·机制·对策》中认为：“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也是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实践所充分证明的强国

① 庄友刚：《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② 刘岩：《风险社会理论新探》，第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③ 贾英健等：《风险社会的人学研究》，第1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④ 冯必扬：《来自竞争的风险——我国转型期的竞争与社会风险》，第6-7页，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

之路。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社会面貌也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我国的改革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风险。”^①李航在《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风险管理探析》中指出:“风险自古便是伴随着人与社会的主题,并随着人类触觉的延伸而呈现出不断扩大与日趋复杂的趋势。种种迹象表明,在21世纪风险问题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引人注目,对风险控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②

其三,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本身的浅层探讨。王浩斌在《马克思主义风险社会理论的形成及其科学内涵》中认为,马克思主义风险社会理论是在深入分析并全面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机制、基本矛盾及其演变规律的进程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总体上经历了萌芽、定型、深化等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社会理论科学阐释了风险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及其精神实质,深入地揭示了风险社会的路径选择,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有效治理风险社会、积极应对风险事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及方法论指导”。^③辛向阳在《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应对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中指出,当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面临着若干风险因素,诸如自然灾害与流行病风险、群体性事件与邪教传播风险、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风险等等。“这些风险的存在既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性风险,也有长期执政带来的考验与风险,还有社会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带来的风险。要化解这些风险,就要牢固树立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风险观,科学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④陈云娜在《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中提出,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阐释的基本纬度之一,具有较为宽阔的思想空间与理论容量。“马克思立足于理性和价值的统一,认为风险社会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活动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此发展阶段里,对人

① 刘先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挑战与对策研究:风险·机制·对策》,第1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 李航:《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风险管理探析》,第1页,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 王浩斌:《马克思主义风险社会理论的形成及其科学内涵》,《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

④ 辛向阳:《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应对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学习论坛》,2010(8)。

类产生局部影响的风险演变成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全球性风险。”^①

在国外学界，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研究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部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马克思揭示出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因素，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在其社会理论中较为重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对于社会风险这样的“负面效应”重视不够：“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把现代看作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但是他们又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产生根本性分裂的根源，同时他设想了一种更为入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②Harney 和 Stefano 在《会计、风险与革命》中认为，风险必须得到充分的理解，这种理解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它被假定为资本，同时它可能会被采用为劳动的形式。根据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风险就是一种可能性的劳动症候。^③

第二，一定程度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未来的社会主义》认为，“恰恰在风险社会中，守成时期也是进步的组成部分。不管人们对新运动厌恶进步的态度怎样批判，它至少促使社会主义者得出下述认识：不能用一种天真的‘对进步狂热欢呼的乐观主义’来争取未来。因此，新运动在把社会现代化提高到更加慎重的层次——在此层次民主的控制机制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参与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④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中表现出来的“集体意识”已经被现代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化”潮流所消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的对立是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本质’永久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将历史经验概括进一个永恒的模式中的做法可以被表述为排中律。”^⑤在这种排中律里，要么资本主义由于阶级斗争的作用而

① 陈云娜：《马克思的风险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第1页，博士学位论文，大连理工大学，2008年。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第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

③ Harney, Stefano, "Accounting, risk, and revolu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Vol.21, No.1 (2010), PP.14-17.

④ [俄]戈尔巴乔夫等著，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未来的社会主义》，第6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

⑤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第10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改变其所有权关系,从而以社会主义社会的面貌重现出现;要么将阶级斗争无休止地开展下去。与此不同,现代社会中“个体化主题坚持了受到排除的中间状况,福利国家支持的劳动市场推动力调和或消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阶级”。^①但是,“个体化”也导致了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风险的产生。乌尔里希·贝克说:“这一朝向社会不平等的‘无阶级性’趋势,在大规模失业上表现为一种教科书式的范例。”^②

第三,将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作为自身理论创造的一个思想来源。Toms 和 J.S.在《劳动价值论、风险和利润率》中试图扩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加入风险因素。其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里,风险因素的起源与转移是建立在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某种不平等关系基础上的,这是一个零和的游戏。^③而 O'Neill 和 Brendan 则在马克思反资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在英国对抗资本主义,尤其反对金融业中对风险充满“饥饿”的银行家。^④

就国内外研究现状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缺陷:

首先,国内研究在主要的时间里局限于用马克思主义审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即使近几年开始出现直接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成果,其对经典文本的挖掘仍然停留在浅层,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直接论述社会风险问题的成果较少。姑且不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对于整个西方“社会风险”理论研究领域而言,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研究存在片面性,不能从整体上把握西方社会风险研究的全貌,仅就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的要求而言,不进行文本的深度挖掘也是不合情理的。此外,国外研究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系统解读,止步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状况的一般性审视。因此,本书以文本解读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风险问题的直接论述中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基本观点,让这一思想完整、系统地展现出来,力图推进该领域的研究。

其次,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是从狭义的“社会”(社会公共领域)的视角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而无论是乌尔里希·贝克还是马克思主

①②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第10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③ Toms, J.S.,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risk and the rate of profi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Vol. 21, No.1 (2010), PP.96-103.

④ O'Neill, Brendan, "Help! I'm a Marxist who defends capitalism," *Spectator*, Vol.305, No.9356 (2007), PP.14.

义的各个经典作家，往往是以广义的“社会”（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公共领域在内）为视角来分析社会风险问题。“狭义”的研究尽管对解决社会公共领域的风险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是公共领域的风险问题从来都不是与社会其他领域截然分开的，其在根源、表现、后果、防范措施等诸多方面都与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密切相关。因此，研究“广义的社会风险”问题就成为本书的着力之点。

再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紧密。当前，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研究尚不深入，导致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探索较多借鉴西方风险理论与经验。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现实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风险管理实践难以有效结合。马克思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时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①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问题，首要的是做到“理论的彻底”。因此，通过深挖文本，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的深刻内涵，可以成为风险思想与风险实践有效结合的第一步。鉴于此，本书就以思想的深挖为突破口，力图在较为扎实的文本根据基础上，反观风险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和难点，从而推进该领域的研究。

三、基本概念界定

（一）广义的“社会风险”与狭义的“社会风险”

由于“社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使得“社会风险”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对应于广义的社会风险，而狭义的社会对应于狭义的社会风险。正如冯必扬所说：“广义的社会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的巨型复杂的系统。如果从广义的社会出发，那么，除个人损失外，人类生活中的各种损失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损失，除个人风险以外的任何风险都可以称之为社会风险。”^②实质上，冯必扬是将广义的社会风险作为个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冯必扬：《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关系探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5）。

人风险的对立面来看待,个人风险与社会风险的总和就囊括了世界上的所有风险因素。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狭义的社会则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并列的系统,狭义的社会损失是指与政治损失、经济损失、文化损失等相并列的一种损失,狭义的社会风险是指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金融风险、决策风险等相并列的一种风险。”^①在这里,狭义的社会风险实质上是指社会公共领域的风险,它并不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风险因素。冯必扬对社会风险广义与狭义的区别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他从研究的角度又认为:“广义的社会风险其外延极广,涉及许多学科,不是社会学这一学科所能研究的问题。所以,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风险不是广义的社会风险,而是指狭义的社会风险。”^②因此,他主张以社会学为学科背景来研究狭义的社会风险,而放弃了对广义社会风险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广义社会风险也有其研究价值,社会学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可以由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等各内容进行整体性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来解决,因而本书采用的是广义的“社会风险”概念。

当前,“学科意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评价某一研究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意识”,主要看其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核心概念,换言之,是否是这个学科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尽管没有“社会风险”概念的明确表述,这一概念是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来的,但是他们却对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等问题进行过大量研究,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广义社会风险”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分析当代社会的风险问题,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因此,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风险思想研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意识”的。

在广义上,社会风险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公共领域的社会整体稳定受到危害的可能性。一方面,风险是一种危害的可能,而不是危害的现实。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借资本家之口论述了资本运动的风险因素:“2磅纱,的确值2先令,这正代表了你(笔者注:指工人)的劳动

^{①②} 冯必扬:《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关系探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5)。

时间的数量。但是，我在把这2磅纱卖掉之前，就得付给你这2磅的钱。也许我根本卖不掉。这是第一个风险。第二，我可能卖得比它的价格低。这是第二个风险。”^①可以看出，棉纱工厂主的风险在于两点：一是棉纱卖不出去的“可能”，二是“可能”售卖的价格较低，这两种情况都会对棉纱工厂主的利益造成“危害”。

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学界，将经济、政治、文化与公共领域构成的整体作为“广义的社会”概念，这已经是一个共识性的观点。无论是狭义的社会概念，还是广义的社会概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都有使用。就前者而言，“《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有‘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提法”，^②这里使用的“社会”概念就是“狭义的社会”概念。而就后者而言，“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和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题目和正文中都出现了‘小康社会’”，^③这里的“社会”概念就是“广义的社会”概念。原因在于，“‘小康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更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人的建设等”。^④其中，以中等收入陷阱为代表的“小康社会”建设障碍，凸显了社会风险问题的重要性。这样，将社会界定为经济、政治、文化与公共领域构成的整体就是一条成熟的研究路径。并且，从经典文本来看，马克思主义正是沿着这条研究路径对社会风险问题展开分析的。

广义的社会风险具有可能性、危害性、累积性和蔓延性四大特征，并分为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和公共风险四类。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经济风险与政治风险是研究的第一个焦点。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分析，出乎笔者预料，马克思对金融风险有过深刻论述，这体现在他对1857至185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考察当中。在这一时期，他针对法国银行Crédit Mobilier展开一系列分析，将经济风险的研究延伸到了金融风险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3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张再兴，赵甲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第220—2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③④同上书，第222页。